

总主编

冯天瑜 张艳国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 ■

古训家训，是指在中
国传统社会里形成和
传承起来的关于治家
孩子的训诫，是以一
种时代社会占主导地位
的文化内容作为教
育内蕴的一种家庭教育
形式。它不仅在中
国宗法、专制社会是
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家庭
教育形式，而且在
中国传统社会步入世
界化、近代化的历史
过程中，仍然有极强
的影响。它是以占主
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
为价值轴和理想轴和
参照系的，因此，它
的文化内容是对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的阐
扬，是一种转换了文
化领域的价值宣扬。



武汉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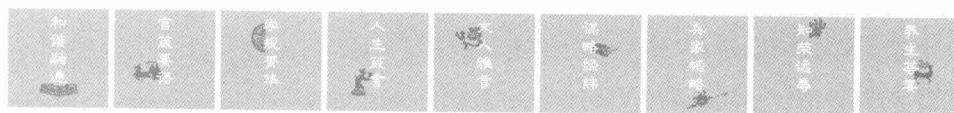
家训辑览

张艳国 编著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

总主编 冯天瑜 张艳国

冯天瑜 张艳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训辑览/张艳国编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10

中华智慧集萃丛书/冯天瑜 张艳国总主编

ISBN 978-7-307-05755-5

I . 家… II . 张… III . 家庭道德—中国—古代
IV . B823.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4209 号

责任编辑:郭 静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11.875 字数:275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755-5/B · 183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时代的步履已跨越 21 世纪的门槛，现代文明不断创造出辉煌成就，上天入地，呼风唤雨，世界统一市场建立、全息式信息迅速传递等昔日的遐想，都渐次演为活生生的现实。然而，现代化带来的并非单向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创生与毁灭双至的“俱分进化”过程，正所谓：“省忧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扬雄《太玄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诸层面，今人都患着不轻的“现代病”，面临着若干不易突破的困局。此间的人类尤需反思，神交古人，听取历史这位导师的谆谆教诲，借重昔时积淀的智慧。

作为人类智慧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华智慧，不仅是中国人的财富，而且也为域外所借重：《易经》成为德人莱布尼茨创立二进位制数学的启示，而二进制正是电子计算机的运作原理；《老子》的“有生于无”哲言为西方建筑大师提供了灵感源泉；《三国演义》是日本企业家从事商战的教材；美军将帅在海湾战争中星夜披阅《孙子兵法》，“声东击西”是其贏

得胜算的谋略……外人研习中华智慧并取得实绩，使国人闻之而怦然心动——难道我们不应当以双倍的热情、更高的灵性，继承、发扬先辈智慧，以推动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创造新的业绩吗！

出于以上思考，本丛书试图介绍“中华智慧之集萃”，以为时贤提供参考。

何谓“智慧”？狭义的“智慧”约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聪明、才智，与“贤德”相对称，故有“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分野。有些思想史家把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称之为“智性文化”，把中国文化称之为“德性文化”。这当然是从东西文化关注的侧重点之异而立论的，并非说希腊不讲德性，中国不讲智性。我以为，区分“智性之知”与“德性之知”确有必要，如果两相混淆，则知识论与道德论便混为一谈，然而，强作两分，把二者割裂开来，又有悖人类精神的整体性。本丛书所介绍的“智慧”，并不全然限于狭义智慧，而涉及广义智慧，或曰“大智慧”，包举才与德，兼容智与贤。如此议“智慧”，或许更切近中华文化的本真面貌：中华智慧不限于“智性之知”，还包含“德性之知”，追求二者的统一，偏执一面、陷入偏锋者则每遭诟病——多智而无德者（如曹操）被斥为“狡智”的“奸雄”；有德性追求却丧失智性者（如宋襄公）则被视为不足取的蠢才，这两类人都不是中华智慧的代表。中国人所推崇的文化英雄（如周公、姜子牙、诸葛亮）都是智者与贤人的整合，是仁、智、勇的统一体。从此种“大智慧”视角方可逼近中华智慧的真髓。

何谓“集萃”？本丛书并非论著的集成，而是编者从“中华智慧”涉及的各个侧面（如立身做人的德行准则、处世创业的韬略谋划、莘莘学子的学规、官吏奉守的箴言，乃至生态

平衡、家训要义、养生之道，等等），分别纂集中华古典的相关精粹，并加以条贯、诠释。读者诸君手持一卷，春诵夏弦，即可获得中华智慧某一方面的概要；若通览诸册，则可观照中华智慧的大貌。当然，如欲升堂入室，摘取智慧之果，则不仅需要“读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因为大智慧的获得，是人生践履的结果，需要从知、行两方面潜心努力。编者愿与读者诸君共同循流探源，寻觅中华智慧的真谛，并虚心汲取各种异域智慧，相互比较、彼此观摩，以求得在现代文明地基上的整合与涵化，达成中华智慧的创造性发挥。

冯天瑜

2007年金秋

书于丹桂飘香的武昌珞珈山

前言 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学意义

传统家训，是指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形成和繁盛起来的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是以一定时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内容作为教育内涵的一种家庭教育形式。传统家训，不仅在中国宗法—专制社会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家庭教育形式，而且在中国传统社会步入世界化、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仍然有极强的影响，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然所处的历史时代有别于中国古代社会，但是，就其家训的内容而言，仍不逾传统家训的轨范。中国传统家训，就其内容而言，是用宗法—专制社会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指导人们处理家庭关系，教育子女成长的训诫；就其表现形式而言，主要是对话，训诫者对被训示者的言谈。这种言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话记录，一种是书信。根据中国传统家训所表达的内容，可将它们归为五大门类：家庭、家政、修身养性、勉学、经世应务。家庭和家

政，讲的是处理家庭关系；修身养性、勉学和经世应务，讲的是教育子女成长问题。关于前者，主要包括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如何处理长辈和少辈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家庭诸关系而达致家庭的团结、和睦、和谐，如何处理家庭的经济利益关系，等等；关涉后者，它主要包括：如何使个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成长，如立志问题、修身问题、养生问题，都有一套完整的说教；在个人成长中如何求学成才，如何做官谋政，如何择友交友，如何处世为人，等等，这些都是家训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传统家训的社会意义，是按照以儒家文化为主轴的社会文化要求，使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合乎宗法—专制社会礼法的要求，做到家庭稳定，和睦协调；使家庭成员按照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而设计自我，勤奋学习，刻苦自砺，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从而是一个对社会有所作为的人。中国传统家训，作为宗法—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深入到家庭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它不能超越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而须服从这个主题，并为建立合乎社会统治阶级利益需要的社会秩序服务。因此，中国传统家训所表达的理想人格图式，个人同社会对接的普遍模式，仍然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

中国传统家训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先秦到两汉时期。它以先秦儒家经典为源，以两汉时期人们依据儒家经典阐发治家做人道理作为其流。在先秦儒家经典那里，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圣贤，从他们所设计的社会理想和伦理道德标准、行为举止规范出发，对那个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家训所进行的提炼，反映在

《易》、《礼》、《诗》、《书》、《春秋》和《论语》、《孟子》、《孝》、《大戴礼》等典籍中。通过儒家圣贤对话这种形式所反映出来的先秦家训，又成为中国传统家训中的经典，直接成为两汉及其以后人们作为治家教子的价值标准而被效法并得到阐扬。两汉时期家训作为先秦家训的流，反映在当时人的家庭对话中，直接引用先秦圣贤的语录，在阐释中体现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这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例如，西汉人孔臧在《与子琳书》中反复引用儒家经典训子：“训曰：‘徒学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则不远。’”^① 司马谈在《命子迁》中引《孝经》训子：“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② 刘向在《戒子歆》中，引用《春秋》里的郤克救鲁魏的故事，教育他戒骄戒躁，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③ 张奂在《诫兄子书》中说：“经言‘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④ 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结合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鼓励儿子努力学习“六艺”^⑤。总之，两汉时期，人们在家训中，是将儒家经典作为格言、准则、信条来看待的。它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形成时期的特征。

第二个时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中国宗法—专制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指导传统社会发展的理论；另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已经建立起了全社会所普遍遵

① 《戒子通录》。

②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艺文类聚》卷二十。

④ 《全后汉文》卷六十四。

⑤ 范晔《后汉书·郑玄列传》。

循的伦理道德体系，行为规范标准，理想追求价值，社会体制，以及深蕴于中华子民心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在家训中，一方面以作为文化主轴的儒家文化为指导，另方面以社会既存的文化价值体系和尺度作为家训的内容，如宣扬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哲学，宣扬儒家文化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和文化信念，宣扬宗法—专制社会所认同的伦理道德风尚、节操，鼓吹传统社会的家庭观，鼓励人们依照时代的价值标准进行自我完善，勤奋好学，立志成才。这就意味着，由先秦两汉以来迄于魏晋隋唐，人们由主要遵循儒家经典进行家庭教育，转而以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为依据，主要以现实社会体制及其文化内涵作为家训的主要内容。这样，魏晋隋唐时期的家训就具有更为广阔的文化意蕴和文化现实感。它也反映出那时人们已进入到自觉的家庭文化建设阶段。当然，这种家庭文化建设依然是以传统社会统治阶级所张扬的文化观念和信念为主轴的。作为魏晋隋唐时期反映家训的文化内容的典型和代表之作，就是南朝北齐人颜之推所撰的《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由二十篇文章构成，它是我国传统社会里第一部家训著作。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它强调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多知明达”，“开心明目，利于行尔”。^①“多知”，是指增长知识，启发愚昧，达到“开心明目”的效用；“明达”，是指提高能力，“利于行”。由于它将人分为上智、中庸和下愚三品，而上智者是天才，下愚者是白痴，因此，教育的对象自然只是“中庸之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② 学习什么呢？作为儒家文化的积极

^① 《诸子集成·颜氏家训·勉学》。

^② 《诸子集成·颜氏家训·教子》。

传播者和张扬者，颜之推突出地主张学习儒家经典，所谓：“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绍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① 只有学通了儒家经典，做人才会“厚重”，达到“忠君”、“孝顺”、“谦恭”、“礼让”、“慎交”的道德境界，进入儒家人生哲学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及天下”的人生境界，处世为人，进退自如。为了学好知识，提高能力，它主张学习书本和学习实践的两种方法：前者是强调“遍观天下之书”，即“博学”^②；后者是强调对于“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③。此外，它还鼓励受教育者乐观向上，同时又强调少欲知足，修身无为；它强调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又重视受教育者了解“贵谷务本之道”^④的不可忽视性。《颜氏家训》关于家庭教育的丰富论述，不仅饱含着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内核，而且融会着深刻的生活真谛和人生体味。它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家庭教育的奠基之作，开山之作。

《颜氏家训》以其恳切周详的说理，委婉生动的叙事，独具匠心的写作和凝重朴实的内涵，深受后世文人褒奖，对中国传统家庭教育影响甚大。如袁衷在《庭帏杂录》下中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王钺在《读书丛残》中说：“北齐黄门颜之推《家训》二十篇，篇篇药言，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清人卢文绍在《注

① 《诸子集成·颜氏家训·文章》。

② 《诸子集成·颜氏家训·勉学》。

③ 《诸子集成·颜氏家训·勉学》。

④ 《诸子集成·颜氏家训·涉务》。

《颜氏家训》序》中说，儒家“六经”虽然了不起，但论及“委曲近情，纤悉周备，立身之要，处世之宜，为学之方，盖莫善于是书”。就是在近世，学者们也十分重视《颜氏家训》的不凡价值，如范文澜评论道：“《颜氏家训》的佳处就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①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家训”始祖与家庭教育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启后世“家训”之作的先河。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自魏晋以后，迄于民国初年，历朝历代都有“家训”一类的著作出版，总计达117种之多^②。由此可见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的文化价值及其巨大文化影响力。

总之，魏晋隋唐时期的家训，反映了传统文化欣欣发展的景象，反映了中国文化在那个时期一体多元化发展的体貌。在那时，文化的内涵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但其它文化内涵或勃兴一时，或渗透其间，或交互影响而互相吸纳，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势。这种文化走向也自然反映到那时的家训中。

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经过第二个时期对孔孟圣贤重视家庭教育的弘扬，在这时，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对于家庭文化的建设，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它虽继续张扬作为文化主体精神的儒家文化，但它也以每一时代的文化内容作为家训的依据。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每一时代，家训著作层出不穷。对后世卓有影响者，如袁采的《袁氏世范》、司马光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第525页。

② 参阅周积明、张艳国主编《影响中国文化的100人》，第201页。武汉出版社，1994年。

的《居家杂仪》、陆九韶的《居家正本制用篇》、朱熹的《蒙学须知》、陆游的《放翁家训》、倪思的《经锄堂杂志》、温璜的《温氏母训》、许衡的《许鲁斋语录》、吕本中的《童蒙训》、高攀龙的《忠宪公家训》、张履祥的《训子语》、霍韬的《渭涯家训》、焦循的《里堂家训》、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邓浮的《家范辑要》等等逾百种。它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由盛世向衰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反映了一种定型形态和臻于完善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因此，它所宣扬的文化内容更为精细，涉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信爱和平、经世应务、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涉及个人、家庭、国家的各个领域，涉及到自我、人我、物我关系的各个环节。总之，它反映的是在一种社会发展已经处于鼎盛并向衰世发展的文化状态，社会体制已经定型和完善以后，如何修身，如何齐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

中国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传统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在家庭领域和家庭关系里的体现，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和体现。所谓中国传统文化，要对它下一个学术界所公认的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目前对它所下的定义不下百种，但其内涵，对它主要精神的概括，学术界还是多所近似的。在笔者看来，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政治为模板而始于孔孟，流变于汉宋，吸收了释、道思想的儒家文化，它表现为大自然、小人事的宇宙图式，自我反省、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重义轻利、重理节欲的道德规范，中庸平和、外圆内方的处世准则，精神超越、深入意境的审美情趣，血亲伦常、等级有序的社会管理，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理论基础、精神支柱^①。说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是从体现文化

^① 参见张艳国：《论中华文化播射的方式及其途径》，《光明日报》，1996年8月6日。

的形态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核质——儒家文化及其经典，就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同质同构的传统家训，也是表达中国传统的一种形态。说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主要是从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蕴上讲的。中国传统家训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作为价值轴、理想轴和参照系的，因此，它的文化内容是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阐扬，是一种转换了文化领域的价值宣扬。中国传统家训体现中国传统，将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灌输到家庭，经过家庭的吸收和加工，改造制作，又传递给社会，使每一社会时代具有新的、现实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内容。这样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只是在类似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才可能产生。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社会成员以农业为生活的依靠，所谓“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①，以农业为本，贵本轻末，重农轻商，把“耕稼之艰难”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和信念，并积淀于社会心理结构的底层，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聚族而居，围绕着农业而同自然发生关系，依循经验，尊重经验，因而以老者长者尊者为本位，作为家庭和家族的核心。在这种血缘宗法式的农业社会里，老者长者尊者具有绝对的文化权威，因而他们最具有从事文化教化的资格（涉世的经历与经验、家族中的权威地位），因此，他们最有权威从事家庭教育。这就是中国传统家训产生和发展的浓厚文化基础。

三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家训，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形态，它有巨大的文化功能和突出的文化特点。

^① 《诸子集成·颜氏家训·涉务》。

首先，传统家训是传统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的家庭化，是社会意识形态内化为个人意识的中介。

在社会领域，社会意识形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识而对社会意识进行的加工和提炼，它集中地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和社会利益，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规范性，但对每个社会成员并不直接具有有效的渗透力。这就是说，社会成员既可能遵循普遍的社会意识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完善自己，也可能仅仅依据自我意识（当然在某些方面也反映社会意识）而设计自我和塑造自我，这种自我设计往往会同普遍的社会意识所规范的社会发生冲突。而解决这种冲突的最好的方法，是将社会意识形态家庭化。只要家训的内容反映和体现社会意识形态，它就可以担负解决这种冲突的重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和体现的传统家训，正肩负着这种重大使命，较好地解决了这种冲突，使社会普遍的社会意识内化为个人的意识，成为个人意识的灵魂和主宰。这样，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的冲突就消融了，就浑然融合为一体了。因此，在传统社会里，每个人就可能自觉地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并依此来磨砺自我，完善自我，使个人的修为体现出一种文化精神。通过传统家训这种形式的文化陶冶，个人的修养、节操、理想、奋斗的足迹，就同儒家理想人格模式——修齐治平同构起来了。

其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和体现的传统家训，它在文化的辐射力中体现了一种伦理的巨大力量，通过这种伦理的超常力量，使社会成员自觉地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接受以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

中国传统家训在教育上的一个主要特征，是老者长者对少辈的耳提面命，透过这种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其中又贯连着

或者说是包容着一种血亲伦常关系。中国传统家训所反映的教育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在这里，是先有血亲关系，而后才有教育关系；教育意义从属于或者说是依附于血缘关系。中国传统家训所张扬的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就是关于血亲伦常的教化，在此基础上所张扬的君臣关系，为君者勤政严正，为人臣者忠节清廉；长少关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放大到社会生活领域里的等级关系，敬老爱幼，尊上友下，等等，也耦合着家庭血亲性的伦理意义。可以这样认为，它是家庭模板的放大，是家庭关系的社会化。正是这种伦理关系，长辈对幼辈的约束力和绝对影响力，家训中所贯彻的关于立志、勉学、修身、养性、经世、应务等原则要求，规范约束，才有可付诸实践的动力。血亲伦常关系，在人际上，既有威严，更有亲善；在教育上，既有直接的灌输，又有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家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形式，与官方教化如刑法、政令、学校等形式相比较，是极为有效的；就其文化影响力和透射力来说，同官方所凭借的行政力量相较，也是最为巨大有力的。

再次，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它以一种通俗易懂的传播形式，将博大精深、玄奥缜密的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给社会成员。

集中地、主要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意蕴和精神的文化载体，是一系列的文化典籍，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者是儒家经典。姑且不论作为中华文化原典的“六艺”，即便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著述，魏晋时期对儒、释、道的演绎，两宋对文化典籍的祖述……都囿于一种高雅的表现形式，又具有经典性，其思想的深刻性，论证的周密性，文辞的华彩性，都是一般社会成

员所具备的有限文化水平所难以诵读和领悟的。要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普及到民间，尤其是将居于中国文化主导的儒家文化的基本内容传递给社会成员，就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将丰富玄奥的道理寓教于乐之中。而传统家训，则是对中国传统精神和内涵的通俗化表达，运用长辈对少辈的谈话方式，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精神和宏伟的文化感染力。口语对话，言谈心交，有别于书面语言，它是一种俗文化类别，而典籍，则是一种雅文化存在。通过俗文化形式表达雅文化内容，它是文化传播上的一种突破和创造。很难想象，如果离开了中国传统家训，中国传统文化有如此巨大深远的辐射力和幅员广阔的影响力。仅此一斑，足可透视到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魅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由官方走向民间，如何由书斋而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如何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忽视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文化意义，是不可思议的。

四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反映任何一种内容的文化类型，它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总要从属于或者服务于那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组成和体现的中国传统家训，同样如此。它是在中国宗法—专制社会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为文化沃壤，因而它不能不反映中国传统社会里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意志，不能不是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这是中国传统家训所映现的鲜明时代内容和阶级特征。但是，这样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家训反动透顶，黑暗无比，仅仅只是一堆有害的糟粕，一无是处。对于中国传统家训，我们应该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文